



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

(1840—1949)

人文
丛书

彭明
程欸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人文丛书

九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

(1840—1949)

彭明 主编
程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彭明主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ISBN7-300-02600-1/K·228

I．近…

II．彭…

III．①思想史－中国－1840～1918②思想史－中国－1919～1949

IV．B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8135 号

人文丛书

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

(1840～1949)

彭明 程歆 主编

出版发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157 号 邮编 10008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涿州市星河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23.625 插页 3

1999 年 3 月 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85 000

定价：39.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人文丛书》编委会

主 编 李文海

副主编 陈先达 王 霁(常务)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 霁 方立天 石亚军 叶凤美

李文海 李 强 陈先达 陆贵山

周文柏 杨 耕 贺耀敏

人文丛书·总序

社会是个有机体，是多种因素的辩证统一。它不仅需要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以直接推动生产的发展，而且需要哲学社会科学以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和人自身，提高人对社会规律的认识，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哲学社会科学的最主要作用，用我们中国的古话说就是修、齐、治、平。而其中，人文学科无论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和对人自身的思想修养和道德境界的提高都是无可替代的。所谓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正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过程中形成的两种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它们应该是互补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可应该并不等于事实。

在以农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中，人文学科处于教育的主导地位。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迅速推进，人文学科由于它的非生产性、非赢利性和非直接实用性，它的主导地位逐步被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所取代。

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人文学科研究和教学缺乏职业吸引力,而且往往是人文学者的个人兴趣和价值追求。人文学科发生危机是必然的。在我看来,西方思想领域所谓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双峰对峙,所谓人文精神的危机,并不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自然科学和技术本身并不排斥人文精神,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市场经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表现。在西方,随着所谓“人类困境”问题的提出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人们逐步认识到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因此,人文学科在危机中逐渐出现一定程度的复苏。但我可以断言,在资本主义现代制度的范围内,他们先辈们所曾创立的人文主义的高峰,如水东去,不可再回。当哲学家说人死了,就是在悲观的眼神中目睹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文精神锐退的预言和感叹。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当然要发展科学技术,提倡科学精神,反对伪科学。但我们决不能轻视人文学科,不能忽视人文精神的教育。西方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重理工轻人文,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思潮对立的历史教训应该吸取。可无庸讳言,在我们确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人文学科危机在我们这里已初露苗头。这很值得注意。人文学科之所以受到冷落,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市场导向引起的反面效应。但同样不应忽视的是我们对人文学科的科学与价值性关系的看法。我们有的论者太过于强调人文学科的非科学性,认为人文学科只是学者们的个人意见、观点、看法,是个人特殊的生命体悟,是不可重复的。所以人文学科不是科学,也无所谓科学与不科学的问题,它只

属于价值判断。如果的确如此，人文学科对于人类有什么价值？国家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办人文学科，出版社为什么花钱出版人文图书，难道仅仅为了请一些专家学者来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和个人的生命体悟吗？如果根本不管这些见解的是非对错，高下优劣，岂不是在基本理论和价值观念方面制造混乱和发生导向错误吗？

把人文学科的价值性与科学性绝对对立起来，片面强调人文学科的价值性，这实际上是重复新康德主义以及西方当代解释学中的某些错误观点。当然，人文学科不同于实证科学。不能用自然科学标准来要求人文学科，要求它数学化、公式化、定量化。人文学科的科学精神，我以为最主要的是反对认识主体的“理解”、“重读”、“破译”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强调人文学科应该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以实践为标准，使人文学科成为坚持真善美反对假恶丑的学科。

人文学科的功能最根本的是对人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培养和塑造。人文学科直接面对的是本系科的学生，这是有限的；而它间接面对的是整个社会，是整个青年的人文知识的教育。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伟大的革命。它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社会的改造，而且在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同时改造人自身，即培养一代新人。这种人不仅要有很高的政治思想素质，而且要有很高的文化素质。我们要使年轻一代不变为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者、狭隘的功利主义者，甚至拜金主义、个人主义者，就必须进行人文知识的教育。如果我们的年轻一代学人不善于哲学思维，对历史尤其是我们近百年的历史的认识一团漆黑，缺乏道德修养和审美情趣、缺乏较好的语言文字能

力，在任何一个领域都不可能有突出的成就。即使掌握某种科学技能，也只能是工匠而不可能成为卓有成就的科学工作者。我们的各级干部尤其是中高级领导干部，如果缺乏人文学科知识，就不可能成为好的工作者，更不用说成为卓越的政治家。人文学科的投资不可能立竿见影，但它的功效是逐步的长期起作用的。它通过对国民素质，尤其是青年一代学人素质的培养，影响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人文学科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重要作用，它对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和吸取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对于为人们提供精神食粮，对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文化素质，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传统。中国的哲学就不完全相同于西方哲学。我们没有明显经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重点转移，也不像西方那样出现单独以本体或以认识、方法为对象的哲学家。尽管中国传统哲学中包含丰富的有关本体论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思想，但它最突出的是对人生和人的品格道德理想的培育，是对天人之际与人际和谐的追求。在中国，文史哲是融为一体的。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家中的千古绝唱，不朽之作。可《史记》的不朽，不仅在于它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而且在于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哲学价值。《史记》中不少名篇佳作集中表现了作者的历史哲学。同样，屈原的《天问》、柳宗元的《天对》、刘禹锡的《天论》既是文学又是哲学。苏轼的《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深沉忧郁，充满庄子的哲学思想。毛泽东《沁园春》咏雪中的名句“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

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讲述历史，品评人物，肯定英雄，歌颂人民，是历史文学哲学的完美结合。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主义、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我们应该认真发掘吸取。

当然，人文精神具有时代特性，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精神，而不是超时代的抽象原则。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以个性解放为目的，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的人文主义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以社会为本位，以仁爱为核心，以修身、治心、睦人、亲亲、尊尊为目的的人文精神是有区别的。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提倡的人文精神，当然包含吸取东西文化中人文精神的积极成果，但不能混同。我们讲的人文精神是要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人民，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的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们决不把人文精神与所谓世俗精神对立起来。我们并不提倡永恒不变的人文精神、提倡抽象的人和人性，而是用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仰，用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用对人类共同富裕的追求来教育人民，并纠正和防止市场行为中出现的某些道德滑坡和价值失落现象。鼓吹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联手来“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来“解构”所谓“宗教和准宗教教条”，实际上是用抽象人道主义与拜金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意义上，任何关于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的召唤，都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

在人文学科的建设中，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

论为指导，澄清人文学科中以及环绕人文精神问题的某些理论混乱。否则人文学科就很难出精品力作，很难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它的应有作用。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我们国家中人文学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部分，人文学科不等于政治但决不能脱离无产阶级政治，我们要反对“非意识形态化”，“非政治化”，文科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等等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人文学科只能走入死胡同。

我们之所以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人文学科中的指导地位，是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人文学科而言，用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进行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在历史学科中史料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历史观。如果否认历史事实的客观性，片面强调历史事实是价值判断；否认历史的规律性，片面强调主体的选择，那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历史学。我们可以看到，有的学者不是从既成的历史事实出发来研究历史，探究历史的动因和规律，而是把对历史的研究建立在一连串假设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辛亥革命，沿着维新变法的路子走中国早就富强了。”何以证明？没有事实，只有如果。可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历史面对的是既成事实，正因为封建制度框架内变法行不通，才发生辛亥革命；正因为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彻底的革命，才发生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事实，明明白白的历史事实，在这些事实背后潜伏着历史的必然性。可见没有正确的历史观就不可能把历史

学变成科学。我们的文学研究，无论是搞文艺评论还是创作，都必须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文学不能离开人，但要正确描述人，必须理解人，这是个哲学问题。现在文学领域中存在的某种性泛滥，把以两性为基础的爱情描述变为在“爱”的幌子下的性展览、性发掘、性泛化，从艺术的天堂坠入黄色的魔窟。

为了提倡与科学精神相结合的人文精神，充分发挥人文学科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我们编辑和出版这套《人文丛书》，以期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人文学科的建设尽到我们应尽的责任。我们热诚希望得到校内外学者专家尤其是中青年学者的支持，请惠赐佳作，共同办好《人文丛书》。

陈先达 1997.1

前言

写一本反映近代中国百年思潮演变发展的著作，是我们多年以来的愿望。在过去一个较长的时间里，史学界一般是把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1840—1919)这一段历史称为中国近代史，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19—1949)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与此相应，研究这一时期的思想历程的著作，也往往以“五四”为界线分成了“近代”和“现代”两部断代史。直到现在的学校教学和教材编写中通常还是如此。然而这样的历史分期并不是很准确的，诚如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经形成的共同认识：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史(包括近代通史和各种专史)，应该包括从1840年到1949年这一整个的历史时期，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从开始到终结，中国民主革命(由旧式转向新式)从发生到胜利的历史。就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而言，也应当以这个长时段的政治和经济变迁为大背景，对这种背景中所发生的百

年思潮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作出系统的耙梳和科学的分析，才能更为深刻地揭示出中国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历史变动期所发生的思潮更迭过程和演变规律，从思想变迁的角度阐释社会发展的方向。这就是我们撰写本书的宗旨。

1. 近代思潮的界定

资本—帝国主义势力的东侵，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的变化，中国内部政治—社会秩序的激荡，将近代中国社会变成了东方各种矛盾的焦点。民族斗争、阶级对抗、社会症结、中外文化的冲突和交融所引发的社会大变动，使制度落后、政治腐败、民生凋敝的近代中国，却因此而处在一个思想文化空前活跃的历史时期。从各个角度反映社会矛盾，表达危机意识，寻求中国出路的思潮，包括外来的和本土的、怀旧的与超越的、理智的和偏执的，等等，五光十色地交织在一个历史的横断面上。人们对许多思潮，有过狂热的信奉或激烈的批判，也有过谨慎的选择或自觉的转向。中国人为寻找救国真理，经磨历劫，艰辛倍尝。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所作的科学概括：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样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近代百年思潮的历程，表现的正是中华民族经历了前两次历史性巨变而通向第三次巨变的认识史。由于这个时代距离今天不远，当年政界学林所发现和思考的一些课题，往往是当时并没有解决以至于仍是今人需要进一步思索并为之继续奋斗的课题。因

此，讨论近代思潮，自然会进一步引发我们探根溯源的兴趣，总结经验的自觉，特别是能加强我们对于中国国情和邓小平理论之来源和背景的理解，从而凭借历史学的智慧，衔接中国的过去和未来。

我们所探讨的中国近代思潮，是指在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那些特定的阶级、阶层、集团的社会心理、人文观点及其理论意识形态的总和。思潮的内在结构多层驳杂，是由从低到高的认识序列互相联结而成的精神体系。我们把一定的社会心理，即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自发产生，并互相影响的对于社会现实的主体反应，^①看做一定的社会思潮的底层结构。因为社会的变动，首先总是在覆盖面极广的社会心理的层次上得到最直接和最迅速的表达，形成人们关怀或参与社会活动的某种动机、需要、情感、态度、理想及其对社会变动过程和结局的感受。中国近代思潮史研究要善于捕捉和读解当年的心理变动特别是时人面对变局的“问题意识”。虽然处在历史情境中的普通人只能对社会和事变的各个侧面产生直观的反应，他们不可能如后人那样对历史过程和结局作出准确的逻辑性把握，但恰恰是大众对某一历史焦点反应的广泛性和趋向性，从而在不同程度上为思想家们的思考方向和表达方式提供了第一手的精神素材。当某种普遍的、流行性的社会心理趋向被认识主体加以综合和归纳时，往往就产生了特定的人文观点或倾向，比如具有不同程度的理性因素的主张、口号

^① 参见沙莲香《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34页。

或格言。特定的观点或倾向在较高的精神层次上凝结、强化和诱导与之相应的社会心理，赋予后者以某种方向感与针对性。这就是诸如“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革旧图新”、“振兴中华”等等观点的由来和功能。而理论意识形态，包括哲学的、政治学的、史学的或美学的等等，则是思想家们依托于一定的社会存在、文化资源并凭借当时的社会心理和人文观点所构筑的理论体系。理论意识形态以其鲜明的历史使命感和理论自觉性，指导社会心理及其相应的观点，力图使之按自身所预设的方向升华和发展，成为维系或变革社会的精神力量。对于社会思潮的如上几个层面，本书所着重阐释的是理论意识形态特别是在近代中国最为突出的以国家观为中心的政治理论，同时也在可能的条件下照应社会思潮的其他层面，以期把思想史研究的主轴从人物分析，转向由于吸纳了社会史研究方法，从而更能表现思潮内容和规模的群体意识分析，更全面地把握各派思潮的起源、走向及其在中国人民的选择中各自不同的历史命运。

2. 近代思潮的起源

近代思潮的起源，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诚如许多研究者的论述，近代思潮是在民族矛盾包括中西文化冲突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或者说，是一些阶级、阶层及其代表人物对于西方冲击的特定回应。但重要的问题在于，中国近代的各个集团在什么样的历史情境里，以什么样的历史经验和思考方式来面对变动，他们如何界定其身临其境的时局，他们的理论认知的内容及其社会影响的大小，归根结底，还是根植在中国本土所

发生的多种历史过程的交织之中。从晚期中华帝国尤其是明清数百年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若干新趋势，到本世纪中叶新旧军阀统治下层见迭出的社会危机，都深刻地制约着近代思潮的理路。中国思想界总是依据其观察内部问题的特定立足点，来认识、选择和协调外部经验和文化传统，形成了相当复杂的思想图景，其中的许多现象和问题，仅仅用“冲击—回应”的构架是不能予以圆满解释的。至于有的论者简单地将“中国向西方学习”，或“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归结为近代思潮的主题，则更是失之于片面了。纷繁复杂的西方各种思想流派，有些被时人所接受，另一些则遭到社会的冷落；而那些被中国人所不同程度吸纳了的外来思想，也往往发生区别于西方原型的流变，同中国的国情民俗、文化传统发生或浅或深、或畸或正地融合。因此，在探索近代各思潮的起源上，既要充分把握中国外部条件的变化，更要认真考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迁和文化积累。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在论析中国近世第一代“经世思潮”的起源和走向时，就需要相对跨越作为近代政治史开端的1840年，而花费一定的篇幅去考察乾嘉以来许多社会事件的交织过程。清帝国内部的民族矛盾、内陆征战、人口剧增、灾荒频繁、农业商业化及其衍生的深广后果，等等，都使明清的社会矛盾具有传统政治—社会体制难以应付的复杂性，并引发了先于近代危机的思想危机和学术变迁。道光中叶轰破中国大门的西方列强，在这里遇到的并不是千年不醒的东方睡狮，而是一个激荡的社会和力图为社会寻找出路的思想界。只

有将这一系列复杂的图景作为近代思潮发生的前提，才能从社会变迁和思潮延续的角度，对包括龚、林、魏等在内的思想家的理论思路和内容，作出比较全面的、有历史感的解释。也不难发现中国近代史序幕时期的思潮，就要比西方冲击和时人回应的过程复杂得多。同理，我们也力图联系中国近代政治和经济变动的大背景，从外部冲击和内部变迁、学习西方和反思传统的双重角度，来探讨其他各思潮的起源和表现其特定内容。这项研究所形成的基本认识是，中国近代各种特定思潮的形成，依托于中国外部和内部的多种历史过程的综合作用；一部中国近代思潮史，本质上是中国人自我发现、自我觉醒和自我选择民族生存方式的认识史。

3. 近代思潮的轨迹

中国近代思潮的演进，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并在此轨迹的制约下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性。对思潮发展的长时段宏观考察与阶段性特征的准确把握，是研究中应掌握的一个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近代思潮史和中国近代通史的具体分期同中有异。一方面，中国近代思潮的发展，和同一时期的民族民主运动在大方向、总步骤上是同步的。在文明的历程上，近代中国没有出现西欧那种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相对独立的思想启蒙阶段。近代中国日益激化和深化的民族危机和社会苦难，加之中国悠久的人文文化传统，使近代思想家们把主要精力倾注于社会和政治问题。他们的理论思辨，紧紧地围绕着社会现实，每一次大的政治运动或反侵略抗争，几乎都伴随着一场思想启蒙。诚如梁启超在《中国近